

走稳经济全球化的复兴之路

◎中国银监会研究局副局长 范文仲



在现在的上海,你工作的机构可能是英国公司,晚上吃饭可能在日本餐馆,开的汽车可能是德国制造,生的孩子可能是美国籍。20年前,这些在中国还是天方夜谭,现在都已经司空见惯了。这就是全球化的力量。

很高兴参加《上海证券报》主办的“2007全球化与上市公司发展高峰论坛”。这几年经济全球化是经济界和学术界经常探讨的问题,今天在座的大都是国际商界领袖,是全球化的见证人和实践者。作为一名研究者,我想从宏观的角度,就全球化发展的新趋势、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企业和银行国际化战略等问题谈谈自己的理解。

全球化:老问题,新现象

首先,全球化的概念外延很广,它既是一个老问题,又有一些新现象。说它老,是因为十六、十七世纪文艺复兴后地理大发现带来的全球贸易扩张,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英法等殖民体系在美洲和亚洲的传播,都可以算是经济全球化的开端。如果在三百年前上汇报主办一个影响世界-上市公司的评选,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可能会站在领奖台上。

说全球化是新问题,是因为二战以来,伴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又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贸易迅猛增长、资本流动加速、劳动力跨境移动、产业经营全球化。

首先是国际贸易规模迅速扩大。“二战”刚刚结束的1947年世界贸易

量只有450亿美元,到1997年半个世纪以后,全球贸易量已达61000亿美元,50年增长了160多倍。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最新统计,2006年全球贸易量达到12万亿美元,是1997年的2倍,1947年的300倍。过去20年间,世界贸易年均增长超过6%,远远快于世界生产的增长速度。

经济全球化的第二个特点是金融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资本流动、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国际化。首先,国际资本的规模增长迅速,数量大而且流动性强。以跨国直接投资为例,2006年全球FDI达1.2万亿美元,是1980年的22倍。其次,金融业务与机构跨境发展,超巨型跨国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不断涌现,并出现了混业经营的趋势。今天获奖的花旗银行和汇丰银行就是典型代表。同时,国际金融市场规模空前发展,全球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量1989年为5900亿美元,1998年上升至15000亿美元,2006年达到3万亿美元,17年间增长了5倍。

经济全球化的第三个特点是劳动力移动日益频繁,通过跨国公司产业经营全球化和服务业外包所产生的全球劳动力资源再分配规模巨大,随着信息科技和外包业务的迅猛发展,原来一些“不可贸易”的软件、工程设计、会计、金融等产业逐渐成为“可贸易产业”。当今的世界,不仅资本、劳动力、科技等生产要素已经实现了国际化,

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影响更为深远,甚至转变了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例如,在现在的上海,你工作的机构可能是英国公司,晚上吃饭可能在日本餐馆,开的汽车可能是德国制造,生的孩子可能是美国籍。20年前,这些在中国还是天方夜谭,现在都已经司空见惯了。这就是全球化的力量。

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

国内很多人都看过中央电视台放的纪录片《大国崛起》,但也许较少人看过保罗·肯尼迪写作的《大国的兴衰》。据这本书考证,直到19世纪初,中国的经济总量在全球经济体中还占有绝对领先地位。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4%,居世界第一位,比之今天世界首富的美国在世界GDP中所占的30%还高。所以,保罗·肯尼迪在书中写道:“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更发达,更先进”。可惜的是,中国与18、19世纪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失之交臂,沦为东亚病夫。

近30年来的改革开放,才真正使中国的发展抓住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战略机遇,踏上了复兴之路。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连续14年居所有发展中国家首位,世界五百强中有四百多家来华投资。国家外汇储备超万亿美元。毫无疑问,中国是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但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

全球化在不断促进全球生产效率提高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给全球经济带来了许多负面效应:首先,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2006年,全球人均贸易额约1850美元,但非洲的人均国际贸易额仅为300美元,而欧洲则达到10000美元。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目标越来越多样,经济决策越来越复杂。现在在中国的发展不仅要考虑内部均衡,还要考虑外部均衡。制定货币政策不仅要考虑国内的经济情况,还要考虑对汇率的冲击。国际

经济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靠一个国家已经很难解决,必须加强国际合作。经济全球化的加深,也使得一个地区的金融波动或经济危机能够迅速波及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国际金融体系不稳定性上升。虽然这两年全球经济发展总体态势良好,资本证券市场大幅上扬,但是,国际金融领域流动性过剩的压力日益显著,对冲基金缺乏监管,利差交易盛行,美国房地产市场信贷风险加大,能源商品价格持续攀升,这些都是经济全球化中的风险因素。

如何应对双刃剑?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任何国家都无法回避,中国必须积极应对,趋利避害。首先,中国企业必须走出去,拓展销售市场,降低生产成本,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打造“中国品牌”。在走出国门的时,要认真了解东道国情况,注意遵守驻在国的法律法规,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做到诚信经营,文明经营。

其次,跨国企业要增强社会责任意识,不能单纯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的经营理念,应着眼于长远发展和生产经营安全,积极参与当地公益事业,实现持续、长远的发展。金融业是经济的核心,中国银行业也要抓住全球化机遇,适时合理地拓展我国银行海外分支机构,增加服务覆盖面;深化公司治理改革,拓展业务范围,增强国际竞争力;遵循国际惯例,增强法制合规意识,加强国际金融市场风险研究;积极培养人才,尽快造就一批既精通业务、熟悉国际规则和东道国法律,又熟悉外国文化、涉外工作能力强的复合型跨国经营管理人才。

总之,经济全球化对国家和企业来讲,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历史表明,抓住机遇就能不断发展壮大,走向复兴,丧失机遇就会走向衰败。我衷心的希望今天得奖的上市公司,能够居安思危,积极进取,在全球化的竞争中长久的站在领奖台上。

(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下一步宏观调控“稳”字当头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陈东琪

不少研究专家认为,中国繁荣的阶段还将持续较长的时间,此间经济社会将高速发展。但短时间内走得过快,可能影响到长期的上升趋势。事实上,当今的形势总的来讲是好的,是健康的,比较良性的,是在宏观调控的可控区间范围之内。当前经济增长保持和实现了平稳态势,生产形势比较好。同时,现在我国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国企、民企、外企等多种经济形式百花齐放,市场竞争充分而激烈。各区域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生产形势等跟以前相比已经大大改善。此外,社会各阶层的收入也普遍增加不少,消费能力增强。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结构也都在改善。单位GDP的能耗此前都是正的增长,但去年GDP的能耗下降1.33%,今年上半年已经公布的数字是2.78%,这是一个很好的指标,虽然我们的能耗那么多,环境那么差,但是要看到转好的迹象,转好的态势,今年力争下降幅度在3%左右。

当前中国宏观方面还面临几个“偏快”的问题,其中包括投资较快,工业增长较快。

此外,中国的出口顺差依然比较大。从一方面而言,这也是好事,说明中国的出口能力,出口竞争力比较强,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的空间比较大。但较大的贸易顺差从负面来讲会带来很多问题。首先这是一个发展目标的问题,并不意味着中国制造有着良好的结构,或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多么有效。

这么快速的出口贸易增长,无疑还会带来外部矛盾,中国在现阶段甚至是相当长的时间,出口动力都是很强的,进口的压力却逐渐变小,所以顺差可能是中长期的,但是中国要力争缓解。

当前,中国还面临着物价上涨的问题。物价的上涨趋势还没有演化为典型的通货膨胀,但的确需要进行宏观调控,这个中就包括流动性过剩。在这方面,一个是银行体系内的流动性,一个是市场领域的流动性,一个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流动性,一个是不同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流动性,这些领域都是有差别的。



“稳”首先应该表现为经济增长的速度上要平稳。今年上半年GDP的增长速度比较快,下半年需要考虑使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收敛。但从现在的增长动力和趋势来讲,要想有较大幅度的调整,依然存在不小的难度。相较于去年11.1%的GDP增长速度,今年如果只增长11%左右就很不错。

第二个“稳”是要稳需求,尤其是要稳投资和顺差这两个需求。

第三个是“稳”市场,包括现在一些热度比较高的市场,还是需要更加稳健的步伐。

这主要还是结构性的流动性过剩,主要表现为总量上为流动性增长。既然是一个结构性问题的话,就需要在总量上加大结构调整力度。第一步是要落实已有的政策。今年的财政货币政策措施是非常多的,可以说是最近几年来力度最大,组合强度最大。我个人认为关键是要落实,这还包括其他宏观调控部门加快出台措施在内。

随着存款准备金以及其他金融政策措施的运用和落实,特别是结构调整措施的落实,中国的黄金发展期能够得到延续,中国经济不会有大的问题出现,还会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从主观意愿和客观趋势都是这样的。我们整个的供给面,都没有大的冲突,所以仍然能够保持快速增长,不会出现大起大落。

高峰对话一:

新形势下公司治理与创新发展的

主持人:本场高峰对话的主题是公司治理和创新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完成股权分置改革这一制度化的变革后,相信对上市公司会带来理念上、治理结构上一个崭新的变化。请各位老总用几句话描述一下在全流通的环境下,公司治理有什么新的特点?

郁亮:股权分置改革以后最大的变化就是一个公司的管理层和员工跟股东的利益更加密切了。现在每次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表决权数超过了50%,而过去只有30%左右。这么多的股东参加股东大会,说明他们对公司的各方面有了更多的关心。

孙为民:以前,上市公司管理层和股东关系没有现在这么紧密,股改后,很多股东积极参与到公司治理中来。股权激励后,管理层利益和股东利益结合在一起,对公司长远发展更加有利。另外,过去大家忌讳谈资本融资问题,现在投资者会主动向管理层建议说,公司发展这么快,不再融资怎么办。我们真正体会到了十六个字,即“同股同权,同心同德,全流通,全心全意”。

贾拴孝:股权分置改革,解决了或者是说清楚了大股东和各个股东之间的利益一致性问题,尤其是对国有企业来讲的。过去应该说大股东不太关注中小投资者,对于中小投资者提的意见也好,不怎么重视。股权分置改革以后,我们在和投资者沟通的意识上明显加强了。

郭兴田:股权分置改革以后,应该说,感受最深刻的就是股东的利益终于走到了一起。以前我们一些特殊的名词可能会成为历史,像什么流通股、非流通股、分类表决等等。股权分置改革以后,第一就是利益一致了;第二就是感觉中小股东越来越变成一种持久性的关注群体,他们对公司的持续性关注在加大;第三是大股东对公司市值从不关心到开始关心,我想这是最主要的三个变化。

主持人:请两位专家来谈谈看,在公司治理方面一直存在着哪些问题,现在还存在什么不足?另外想问一下公司

股份公司在社会责任里不是简单地学雷锋,整天地承担社会责任。这里而要考虑在全球化的情况下,寻求更多的资源,追求自己公司长期成长的同时,更综合性地考虑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其他利益的协调性。

财务会计方面的专家陆院长,能否从公司报表中看出公司好坏?

贾康:我的感觉是这样的,我们过去在改革渐进的发展过程中,比较强调中国特色,实际上中国公司,也代表了中国特色,在最近一段时期的改革中,更强调的是加强规范性和国际接轨,原来的中国特色不是说完全的让它消失,但是确实有一些过渡性的中国特色我们没有必要固守。与国际接轨,实际上是和国际上比较规范的规则接轨。在比较规范的基础上,加入竞争,打造自己的竞争实力。我理解的核心要素,就是打造核心竞争力。

陆正飞:如果说股改以前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是同床异梦的话,那股改之后是不是就是同床异梦了呢?我的观点是,股改对于改善公司治理确实有作用,但是它只是推动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改善的力量之一,我们不要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它的身上。第二,从财报怎么到公司的治理?从研究会计的学者角度来看,我私下经常跟朋友说,看年报不如看企业,看企业不如参加公司的董事会,看公司的治理状况怎么样,最好是参加董事会。我现在担任几家公司的独立董事,我就是想看看他们到底怎么做的,我觉得通过年报要看到公司的治理状况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主持人:不久前尚福林主席在首届上市公司高峰论坛上,特别的谈到创新发展时上市公司要稳妥的开展公司治理活动,我想问一下烟台万华的郭总,你们是如何理解公司治理和创新之间的发展的关系?

郭兴田:万华成立开始,我们提出了观念创新是一个前提,体制创新是先导,技术创新是主线。应该说万华能够走到今天,我认为在体制创新的这一点应该说是我们感触最深的。前些天我们董事长跟证监会前任领导谈到,是先改制后上市带来了万华的今天。万华不是在股市上赚了钱,而是体制上革命性地改变。万华从开始创立到现在,我们感触最深的就是每家每户都有一个法人制的结构,有董事会、有监事会,但这只是形式,我们关注的是如何提高法人结构的有效性,它的核心就是让公司董事会的有效性提高,公司董事会的有效性提高,就是靠董事们的勤勉和董事们利益的多元化。万华开始成立的时候,中国还没有董事,我们有小董事,那个时候没有独立董事,我们起名叫专家董事。在11个董事里面,大股东只占了3、4个,这个在中国是比较罕见的,万华认为核心要保证我们董事会的有效性。

主持人:下面一个问题,我想问万科A的郁总和苏宁电器的孙总,你们两家企业,和我们的老百姓生活最为密切,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零售业巨头。我想当今的社会不仅要要求企业创造效益,还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两者之间有时候是有冲突的,请两位谈一下企业在这个方面应该如何协调?

郁亮:对于房地产行业来说,我们社会责任是很突出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公司要尽可能的为股东赚钱,另一方面我们同时要兼顾社会的感受,同时为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空间。这两个结合在一起我们很为难。第一个我们不能拿股东的钱去做好事,

在去年的股东大会上,我们的股东们专门通过了万科每年拿一千万出来,做一个基金,股东赞成我们在这方面做一些举动来。对于万科来说,我们可以牺牲一点点短期的项目,但是我们为股东提供了更好的产品,这一点无论是股东还是行业都是需要的,现在很感谢股东对我们的理解和支持。

孙为民:就这几年的发展来讲,是从一个小企业逐渐走向大企业的过程。从小企业的治理方式来说,可能跟社会上的一般平民百姓是一样的,认为天塌下来还有大个顶着;但作为大企业来讲的话,就觉得有一些东西是责无旁贷地需要去承担的。实际上从我们的感受来讲,现在两个方面的压力对我们管理层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企业有这么多的员工——我们是一个劳动力密集的行业,企业的员工,员工的家属都非常重要。而且我们的员工实际上待遇还是偏低的,在发展的过程中间,这个行业的利润也不是非常丰厚,所以发展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要考虑到整个行业的和谐发展的。现在在家电业,包括其他的零售业中,有一些不和谐的东西。这些不和谐的东西客观上是存在的,但实际上,根本的原因并不是哪个强哪个弱的问题,而是供应链的规则还是传统的,它没有适应现在大的零售业制定出来一种新的标准。这个标准不只是为自己服务为消费者服务,还有就是为上游的制造商服务的。一旦新标准出来,完全是可以把整个产业链至少提升10%的利润空间,我想这是我们要考虑的未来的责任问题。

主持人:我想请两位专家也谈一下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



主持人:程培松(《上海证券报》副总编辑)

嘉宾:

郁亮 万科总经理

孙为民 苏宁电器总裁

贾拴孝 宝钛股份总经理

郭兴田 烟台万华副总经理

贾康 中国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陆正飞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记者 徐汇摄